臺灣文學研究集刊　第二期
2006年11月　　頁1~32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日、臺間的漢文關係——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

黃　美　娥**

摘　要

西元 1895 年至 1945 年間，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藉由語言／文學／文化系統下的「漢文」做為一種中介，日、臺間衍生出各式錯綜複雜的交混、角力關係。這種以「漢文」為基礎所形成的「同文」關係，雖有殖民統治的緊張、壓抑或頡頏、能動面向，但也不乏漢字圈的跨界交往、流動情境，呈顯出對立史觀之外的多種可能性。對此，本文不同過往偏從殖民統治框架看待雙方「同文」關係，本文更聚焦於日、台間的漢文跨界流動，及其所帶來的詩歌知識生產的考察，在日人目前亦少關切的殖民地漢詩論域，去思考日本漢詩對於臺灣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其在治臺的關鍵時刻，如何被引用、挪用或拉扯、抗拒？日本漢詩的輸入來臺，將形成何種知識化過程？如何被處理、思考、編纂、分類或批評？而來自異域的知識如何轉化成自我的範疇，安置在臺人的古典文學知識系統中？此一過程是資源分享？亦或是同文的斲傷？臺人的漢文想像究竟會經歷怎樣的思維演繹？漢文邊界是否產生變化？對於臺灣古典文學知識的生產／消費又有何影響？文學知識新秩序的跨界平衡／重組如何進行？

大抵，本文要從跨界流動語境中嘗試提出一個新觀察角度，但這並非通盤否定過去殖民抵抗的主流論述，只是要把問題推向更為廣闊的視域，以觀察若干可能遭受遮蔽的問題。文章內容分由「日人來臺：殖民/跨界的漢文活動新頁」、「日本漢詩的脈絡化：臺灣報章及『詩話』的進口／轉手知識」、「『風雅』論及其他：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轉變/轉換」三方面，進行殖民地日、臺漢詩接觸與形變關係的剖析，以呈現出日治時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狀態。

關鍵詞：漢文　同文　跨界　日本　日治時代　知識生產　古典詩歌風雅論

95.7.18 收稿，95.10.19 通過刊登。

* 本文為筆者國科會計畫【世變中的啟蒙：文化重建與教育轉型（1895-1949）——日治時代臺灣傳統人的新國民想像與文化論述】第二年子計畫「民族想像、歷史語境、現代進程：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文學知識的建構與發展」的部分研究成果，計畫編碼為 NSC　94-2411-H-004-048，承蒙獎助，謹此致謝。又，文章初稿曾於 2006 年 7 月 21 日由東京大學主辦之「近代東亞的知識生產與轉換」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宣讀，今加增補完成。

** 政治大學中文系、臺灣文學研究所合聘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漢字」，是東亞地區的重要文字遺產／資產，近年來在亞洲論述的新關係下，對於漢字圈的討論，特別是漢字所歷經的近代變化，以及其與各國國語的相生相剋，或漢字的受容與地域關係等問題，已引起學界極大關注[1]。對於此一遺產／資產及其相關經驗的評估，也有了相應的研究方法的思考與實踐。

至於臺灣「漢字」的起源與生成，在明、清時期原本是對中國漢字傳統的繼承，但乙未（1895）割臺後的臺灣，由於遭受來自日本或西方世界因素的刺激與影響，如大和文化的同化威脅、漢文教育危機、西方思潮進逼、新學的挑戰等，儘管時人知悉「漢字」與「漢文」二詞的意涵其實有所差異，但卻常常混用，且更往往使用能融攝傳統國故、典籍、漢詩文、漢文化意義的「漢文」一詞，來呈顯諸多問題的麕集。正由於「漢文」之詞義，頗與漢文字、漢文學、漢學、漢文化、漢文教育等面向，交相構築與層疊積累，故實際指涉了語言（漢字）、文學（漢詩文）、文化（漢學、儒學、儒教）三系統的問題性；何況三系統間亦有流通、挪移現象，所以「漢文」較諸「漢字」一詞，毋寧更是具有彰顯日治時代臺灣多重歷史語境功能的重要話語（discourse）。

針對日治時代勾連著語言／文學／文化問題的臺灣「漢文」而言，在過去研究所強調差異、對抗而蔚爲主流的後殖民論述外，取徑於現代性、語言政治、文化統合論的研究，迄今也已累積不少成果[2]。其中，尤以文化統合的交混論述與本文之研究最爲相關，而近期臺灣的相關研究，乃以日／臺儒學、漢文教育與國體論間的關係探討，較早獲得注意[3]，繼之則是漢詩文「同文關係」的挖掘[4]，上述研究指出漢文的工具性角色；因此，日、臺「同文」問

[1] 關於以漢字為出發點的各式論述面向，可以參見村田雄二郎〈漢字圈の言語〉的說明，該文為村田雄二郎、C・ラマール，《漢字圈の近代　ことばと國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之序文，頁 1-13。

[2] 如日本小森陽一、若林正丈、筱原正巳對於殖民地臺灣語言問題有過討論，駒込武對於總督府文化統合策略進行分析；臺灣方面較新觀點的研究，則有陳培豐、柳書琴、川路祥代以及筆者的論述。

[3] 如陳培豐，〈殖民地臺灣國語「同化」教育的誕生——伊澤修二關於教化、文明與國體的思考〉，《新史學》12：1（2001.3）、〈重新解析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同化』國語教育政策——以日本近代思想史為座軸〉，《臺灣史研究》7：2（2001.6）；川路祥代，《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會》（臺南：成功大學中研所博士論文，2002）。

[4] 參見柳書琴，〈《風月報》中的同文論述：殖民主義附身的悲劇〉（「文學傳媒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題，遂由文字範疇轉向思想範疇，不過所論大抵較集中於帝國主義殖民統治技術的文化／文學政治。

倘若重新回溯這段日、臺漢文接觸史，在臺灣作爲日本殖民地時的西元1895年至1945年間，透過語言／文學／文化系統下的「漢文」爲中介，日、臺間實際衍生出各式的交混（hybridity）、角力關係。對於近代日本而言，漢字既是歷史的漢字，也是現實的中國，故就文化民族主義而言，漢字在日本國語的確立過程中，是以「他者」（the other）身份存在於歷史語境中；但由於帝國主義擴張所需，漢文卻又弔詭地扮演了爲侵略政策服務的工具，甚至在1937年中、日戰爭後，成爲日支親善論的媒介，導致皇民化國語風潮下傾頹的臺灣漢文命運，出現曖昧的轉機，而使歷時發展過程中的日、臺間「同文」關係，愈形複雜。另外，與前述不同的是，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內地漢文漸趨失勢，剛取得的臺灣殖民地，意外提供了熟諳漢文者的發揮空間，其與本島文人有所交流、互動，加上日本漢文學知識亦隨著傳播媒體、書籍消費……等管道進入臺灣，遂形塑了臺人別具面目的新漢文想像。

相關情形，說明了日、臺間的漢文「同文」關係，雖有殖民統治的緊張、壓抑或頡頏、能動面向，但也不乏漢字圈的跨界交往、流動情境，呈顯出對立史觀之外的多種可能性。因此，殖民地時期的臺灣，無寧可被視爲一個日、臺漢文接觸後引起諸多問題性的論述匯集場域。對此，本文將先以日、臺間漢詩「接觸關係」的「問題化」著手，不止於以殖民統治框架看待雙方「同文」關係，亦要聚焦於日、臺間的漢詩跨界流動，及其所帶來的文學知識生產。在日人目前尚少關切的臺灣殖民地漢詩論域[5]，去探索日本在臺漢詩的存在意義，

文化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嘉義中正大學中文系主辦，2003.11.7-8）、〈從官製到民製：自我同文主義與興亞文學〉（「第一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現代文學的歷史迷魅」會議論文：南投暨南大學中文系、歷史系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合辦，2003.11.13-15，後收錄王德威、黃錦樹合編《想像的本邦：現代文學十五論》（台北：麥田，2005.05.05））二文，她注意到「同文問題」在侵華戰爭爆發後如何促使臺人自我參與帝國主義的文化統合建構，出現文藝自我異化的惡果。其後，陳培豐，〈日治時期的漢詩文、國民性與皇民文學——在流通與切斷過程中走向純正歸一〉（「跨領域的臺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國家臺灣文學館主辦，2005.10.15-16，後收錄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編印《跨領域的台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6）），則更進一步強調日、臺漢文實是「同文」而「不同調」的關係，聲調差異說明了「臺式」漢文，終究無法承擔負載日本國民性、皇民文學的任務。

[5] 目前日本學界對於殖民地臺灣文學或日人在臺文學創作的研究，探討重心大抵是在新文學作家及作品上，能夠對於來臺日籍漢詩人之行蹤及創作表現有所關注者，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並且思考日本漢詩對於臺灣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其在治臺的關鍵時刻，如何被引用、挪用或拉扯、抗拒？臺灣對日本漢詩的受容能力如何？日本漢詩進入臺灣，將形成何種知識化過程？又，來自異域的知識如何轉化成自我的範疇，而安置在臺人的古典詩歌知識系統中？此一過程是資源分享？抑或是同文的斲傷？這對於臺灣古典文學的知識生產／消費又有何影響？透過上述問題的釐析，進以剖析日本漢詩在輸入／介入臺灣漢文場域後，所引發的殖民地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狀態。

二、日人來臺：殖民／跨界的漢文活動新頁

乙未割臺的世變，不僅衝擊了臺灣政治、社會、經濟等面向的發展，其於文學層面實際也發生了重大的影響。過去文壇主力的科舉士子，相繼選擇內渡以逃避異族統治，因此出現不少文人外移的情形[6]，如丘逢甲、許南英、施士洁、汪春源……等重要本土文人便返回原籍地，促使臺灣文壇的領導權產生轉移，因故未內渡的文人有了更多躍居要角、掌控發聲的機會；而另一方面，則是若干日人的加入[7]，他們藉著漢詩文爲媒介，與臺籍文人進行官紳雅集，或徵詩交流，或彼此唱酬，卒而造成了臺灣文學生態的變革與文學場域的變遷。

這群熟諳漢詩文寫作的日人，在臺身份不一，但卻在來臺之初，就成功進入臺灣文壇，與臺人接觸頻繁，快速掀起一股日、臺漢文親密交流的高潮。楊永彬仔細閱讀日治初期最早出現的報紙《臺灣新報》「文苑」欄後，依據1896年至1898年間報刊所載文學創作與文學活動紀錄，發現除總督府行政官、地方

以森岡緣投入心力最多，自 2002 年迄今已撰有〈日本京都學派漢學者鈴木虎雄之臺灣體驗與中國體驗〉、〈阿里山現存「琴山河合博士旌功碑」初探——西田幾多郎、鈴木虎雄、市川三祿、河合鈰太郎的交流足跡〉、〈豹軒の渡臺〉、〈近代日本漢詩人の草山詠——鈴木虎雄と久保天隨を中心に〉……等文。

6 此由同治、光緒年間臺人考取科名者的人數與臺人定籍期限的去就日(1897 年 5 月 8 日)前所作數量統計相較，便可略見一斑，參見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5)，頁 28。

7 這群來臺日人，郭水潭指出其身份是「失意的政客與自由主義的學人」，語見郭氏〈臺灣日人文學概觀〉，文見羊子喬編輯《郭水潭集》（臺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94），頁 290。而吳密察更留意到來臺日人，多屬日本明治維新中敗者的東北人士與原為德川幕府教學的漢學者，參見吳氏〈「歷史」的出現〉，文章收入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南港：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1997），頁 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首長外，日本漢詩人以官廳吏員爲數最多，記者、教師、法官次之，餘爲醫師、和尙、軍官、警察、神職人員、實業家等，約有二百人左右；而與日人相唱和的臺人，則有三百人以上[8]。而這樣頗具規模的日、臺漢文交流現象，大抵持續到大正時期而未歇，洎自大正末、昭和初，由於日本漢文學的漸趨衰微，才爲新文學者所取代[9]。

細繹這段跨界的漢文學交往歷史，當時曾經來臺的日人，較著名者有森槐南、內藤湖南、中村忠誠、村田誠治、田原天南、籾山衣洲、大橋豹軒（即鈴木虎雄）、加藤重任、小泉盜泉、日下峰蓮、小松吉久、國分青厓、勝島仙坡、久保天隨、木下大東、佐倉達山、館森鴻、豬口鳳菴、鷹取岳陽、伊藤貞次郎、尾崎秀真、伊藤壺溪、三屋清陰、小野西洲、神田喜一郎、鹽谷溫……等[10]，由於各人寓臺時間長短不一，角色亦異，自然引發之刺激與影響有別。對此，過去常以「懷柔論述」做爲歷史詮釋框架，而誠如1896年，水野遵、土居香國、加藤重任、黑江蛟在龍山寺舉行的「觀月雅會」；1899年，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在「南菜園」邀宴詩人；1905年，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於官邸「蔦松閣」落成時，對外徵詩，與臺人吟和；1921年，田健治郎總督則與臺灣詩人茶敘賦詩，並結集出版，無可否認的，這些吟宴的確有助化解割臺後，臺灣傳統文人對於漢文學存滅處境的憂慮，以及異族敵對的殖民處境，強化文學政治功能。不過，如此的論述趨向，側重了政治目的論的理解，但也極易忽略其中所隱藏的跨界流動的文學知識生產。

是以，另一個可供解讀的入徑，當是對日本在臺漢詩活動／旅行史的「再發現」[11]。實際上，日人在臺寫下不少作品，而其中遊臺書寫更是蔚然成風，

[8] 參見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文章收入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2000），頁 115。又，關於日治初期來臺的能詩日人，楊文也列表說明了其人在臺時間及生平簡介。

[9] 參見郭水潭前揭文，同註 7，頁 298、頁 309。

[10] 關於來臺日本漢文人的名錄及其作品舉隅，參見郭水潭，〈臺灣日人文學概觀〉、〈日僑與漢詩〉，收入氏著、羊子喬編輯《郭水潭集》（臺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94）；至於日人發表於報刊的漢詩文作品目錄，則可參考本人編著之《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文學作品目錄》（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3），頁 763-938。

[11] 對此，目前臺灣相關研究仍少，早期可見者如郭水潭〈日僑與漢詩〉，出處同註 10；近者如陳逮換，《久保天隨及其澎湖游草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論文，2002）；張寶三〈任教臺北帝國大學時期的神田喜一郎之研究〉，文見張寶三、楊儒賓編，《日本漢學研究初探》（臺北：喜馬拉雅基金會，2002）之研究，以及謝崇耀，〈試比較清、日政權於臺灣漢詩發展的成就與影響〉（文見《臺灣文學評論》3：3，2003.7）等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在森鷗外《鷗外全集》、內藤湖南《湖南詩存》、鷹取克明《岳陽百疊韻詩》、早川直義《如矢文集》、石川柳城《稗海槎程》、玉木懿夫《遊臺詩草》、阪本蘋園《臺島詩程》、青山尙文《臺灣雜詠》、小野田三徑《小野田三徑遺集》、三島中洲《臺風雜記》、國分青崖《青崖詩存》、佐藤守門《心錠集》、關口隆正《臺灣歷史歌》……等人作品集中[12]，皆可獲見臺灣自然勝景或風土人情之描摹；而這樣的寫作趨勢，除了異國情調的好奇驅使外，頗與日治初期日人所興起的臺灣風土詩寫作／徵詩風潮，以及後來舊慣調查活動強調進行臺灣實地踏查，植基「臺灣趣味」的創作美學有關。此外，日人同時也與臺灣文人多所往來，共同參與詩社活動，如北臺最大的詩社——瀛社，便常見日人與會；而部分日人甚至自組詩社，如「玉山吟社」、「淡社」、「清流吟社」[13]、「穆如吟社」、「南雅吟社」等，其中成立於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底的「玉山吟社」，是目前所知日治以後日人最早成立的漢詩社，發起人水野遵、土居香國、金子芥舟、加藤雪窗……等，他們屢招陳洛、黃茂清、李秉鈞等臺人與會，彼此有著良好人際往來。當然，玉山吟社的首開日治時期詩會先河，對於臺灣詩社活動之延續發皇尤具推動作用，有益於臺灣詩社活動的再興與發展，其文學意義值得正視[14]。

然而日、臺的漢文接觸關係，在文學層面的作用力，並不止於上述引發書寫臺灣風土詩的熱潮，或促使臺灣詩社活動振起而已，日人對於臺籍作家的漢詩文寫作，也表達高度關切，除了若干由總督府策導，具有宣示政治意義的詩集印行如《慶饗老典錄》、《大雅唱和集》、《東閣唱和集》等外，明治三十年（1897）《臺灣新報》記者黑江松塢，以其一人之力，在蒐集日、臺百餘家之詩作後，擬做更全面之徵稿，而有募刻《南瀛串珠》之念[15]，此舉顯示日、臺漢詩界交流的文學成果，在日治初期就已展露成果。再者，也有日人因爲關注臺灣詩史、詩家，而欲介紹給內地詩人者，明治四十二年（1909）《漢文臺

[12] 以上資料來源，乃由臺南成功大學施懿琳教授主持之「全臺詩蒐集、整理、出版」計畫小組提供，謹此致謝。

[13] 郭水潭〈日僑與漢詩〉一文對於日人在臺漢詩社之介紹，並未言及「清流吟社」。此社創於 1910 年，為游宦臺中之內地人所組織，以永鳥蘇南為主幹，社員包括柳田陵村、田口香石、西山樵夫……等十餘人，每月課詩一回，參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4 年 10 月 29 日第 4105 號（三）、11 月 16 日第 4121 號（三）。至於其他日人詩社之成員，郭水潭〈日僑與漢詩〉已有清楚說明。

[14] 關於日本在臺詩社活動、吟宴情形及其與臺灣詩社活動再興、發展之影響，可參拙文〈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文刊《臺灣風物》47：3（1997.9），頁 45-50。

[15] 參見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同註 8，頁 1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灣日日新報》便載：

> 安江正直氏，此際擬搜臺灣有史以來，諸詩人佳什，纂輸成冊，謂之鯤瀛詩選。其編次將倣俞曲園東瀛詩撰之體，欲囑蔡國琳、羅秀惠、林痴仙其他諸氏為之評校。然臺灣開闢，迄今經二百餘年矣，詩人之佳什，類多敓（按：當是「散」之誤）逸，即近人之珠玉，亦寶之者少，欲自為蒐集，終覺力有未逮。爰欲廣徵江湖，其有自製佳什，或記憶古人名作者，以橫書謄諸吟箋，並附作者小傳……，書成，欲以紹介內地詩人云。[16]

以上，不管是總督府官員、記者對於日、臺詩人合集出版的強烈興趣，或內江正直專爲臺人而進行的《鯤瀛詩選》粹編，都多少指涉出日、臺漢文接觸後，彼我的文學關係性有著多元的存在意義，而日方也有認識臺人作品的慾望與熱情，且資料顯現日人對於臺灣漢詩的認識需求，早在日治初期就已開始。

同樣在日治初期便已展開的，是臺人對於日本漢文學知識論的生產／消費、交換／轉換，其之所以能順利進行，除了部分日籍文人的直接宣傳外[17]，也由於日、臺文人交通互動而能從事知識交換[18]，故若干臺人可以直接掌握日本漢文學的相關訊息[19]，此外亦得之於教育啓蒙、書籍閱讀、報刊媒介……等，因此更多攸關日本過去或現在的漢文學知識得以直接、間接進入臺灣，甚而與傳自明清中國的臺灣古典文學原有之知識論有所交混，形成了臺人的新漢

[16] 參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2 年 7 月 18 日第 3165 號（五）。案，日治時期之報刊雜誌，行文標點符號不同於今日，或有註記不明，為利今人閱讀，筆者在援引時均改以新式標點，以下皆同，不另說明。

[17] 如尾崎白水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有〈咳珠樓詩話〉之作，文章對於日籍漢文學家有簡要說明，如刊於明治 40 年 10 月 9 日第 2831 號的文章，介紹了本田種竹之生卒年、師事對象、詩歌風格、創作情形，並引用森槐南的悼文對本田詩人畢生行誼予以略述，宛然一篇詩人小傳。

[18] 謝雪漁是日治時代極為活躍的臺灣漢詩人，從其《雪漁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所記，曾經與其往來的日本漢文人或熟諳漢詩文的文人，至少有守屋善兵衛、中村忠誠、村田誠治、田原天南、石川柳城、籾山衣洲、小泉盜泉、日下峰蓮、小松吉久、久保天隨、木下大東、館森鴻、諸口鳳菴、鷹取岳陽、尾崎秀真、伊藤壺溪、三屋清陰、小野西洲、藤波千溪、……等，藉此或可一窺日、臺文人昔年之交流盛況。

[19] 來臺日人通常直接扮演一個傳播日本漢文學資訊的角色，如臺北文人黃植亭因為入田披雲之子來臺而與黃氏相善，遂得讀披雲翁詩稿數百首，並為作一、二短評，參見〈拾碎錦囊〉（二百十五），文載《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9 年 5 月 6 日第 2402 號（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視域與想像。只是，這一個日本漢文學的輸入過程，究竟日人的漢文學觀念，哪些被結構進臺灣本土的知識體系來？被結構後的觀念價值是否有所變動，其內涵又是什麼？

首先，可以發現的是臺灣漢文學「邊界」的擴大與位移，日本漢文學進入了臺人的文學視域內。在割臺之前，臺灣本地文人鮮少有機會瀏覽中國以外之異域詩文，但翻閱日治初期的《臺灣新報》、《臺灣日日新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後，可以發現這些報章媒體在日、臺接觸伊始，便扮演著介紹日本漢文學及其相關知識的推手，日本漢文學得以不扞格而順利地進駐臺灣古典文學知識場域，成爲臺人在中國古典文學與臺灣自身文學外，所開始接觸的一個新知識類型。

而報章中對於日本漢文學的傳播，實際是多層面向的進行，這些介紹除了時人作品之刊載外，有時亦闡揚先賢幽光，同時兼顧過往與當代之表現，且涉及了多元的文學類型，如有關「小說」方面，日本漢文小說的刊載，於稍早的明治三十二年（1899）至三十三年（1900）間《臺灣日日新報》的「說苑」欄，便可以發現日人以日本史乘傳贊爲基礎所創作出來的稗官小說，這對於向來尚未從事小說寫作的臺人而言，無疑具有極大的文類啓發；況且日人若干漢文小說的轉載，還產生意想不到之影響性，譬如《本朝虞初新志》部分作品便曾載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而其中由菊池三溪所改寫的〈胭脂虎傳〉於臺灣刊登時，喧騰一時，引來注目，甚至有〈胭脂虎傳補遺〉的出現，一臺人記者就在作品後面附記若干文字，使此日本著名犯罪小說在臺灣有了新變貌。[20]

此外，日本漢文與國體論、儒學的關係性，亦與臺灣古典散文糾葛甚深，值得關注。[21]當然，日本漢文學的植入，對於臺灣古典文學知識論影響最大者，莫如「詩歌」方面，而詩歌原本就是日治時代臺灣古典文學創作的主流，那麼在殖民主義與跨界文化流動兩種看似具有緊張性的迥異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日、臺間的漢詩關係與知識生產將會產生何等辯證與變化？這當是日、臺漢文接觸史上極爲精彩的一頁。

[20]參見呂淳鈺，《日治時期臺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考察》（臺北：政治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2004），頁 41-42。

[21]此部分，如川路祥代以吳德功的鄉紳角色與其於臺灣儒學社會中的話語，以及《臺灣文藝叢誌》二十餘篇「孔教論」文章為例，討論甚深，參見《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會》（臺南：成功大學中研所博士論文，20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日本漢詩的脈絡化：臺灣報章及「詩話」的進口／轉手知識

> 就知者來說，任何已知的事物都一定是有系統的、經過證實的、可以應用的、顯而易見的。而任何外來的知識系統都是矛盾、未經證實、不能應用、奇異和不可思議。
>
> 佛來克（Ludwik Fleck）[22]

對於臺人而言，若非殖民因素，實難有機會接近日本漢詩，對此跨界而來的「同文」產物，也就有著複雜糾葛的心緒。而對於日本漢詩的認識來源，除了當時幾種已發行的詩歌選集，如《瀛洲詩集》、《瀛海詩集》……有所採錄、呈現外，主要仍靠大眾傳媒的中介，日本漢詩才得以大量地進入臺人的文學視域中。報章的媒介方式有二：其一是，報章「詩話」專欄的「促銷」；其二是，藉由每日刊載日人的詩作，展示其人的創作技巧與美學表現。就臺人而言，在面對日本漢詩及其知識論時，不管引介者或閱讀者，其實都歷經了一個從那端到彼端的文化跨界過程，從未知到已知的精神想像狀態。

許是因爲「同文」關係，因此判定臺人可以接受無礙[23]，故早從日治初期起，日本漢詩便源源不斷刊載報上。實際上，這種在新聞紙上登載漢詩作品的情形，在明治時期的日本內地風氣已盛，當時東京、大阪的的報紙都闢有漢詩專欄，專欄主筆也都由著名詩人擔任，例如創刊於西元1874年與政府關係密切，有「御用報紙」之稱的《東京日日新聞》便有「文苑欄」，欄內所刊多屬政壇詩人作品[24]。相同的是，日治時期臺灣最早創設的報紙《臺灣新報》與最大官報的《臺灣日日新報》在成立之初，其報紙欄位中，皆立有「文苑」欄以載日人漢詩，可知這種作法當是受諸內地影響。

於是，日人詩作的風格得以顯現於臺人面前，對於本島文人極具吸引力，再加上報社記者的扼要評點，日人漢詩精髓更得以不隔地爲臺人所閱讀、吸收，如籾山衣洲在明治三十二年（1899）發表於《臺灣日日新報》的〈羈懷〉之作：

> 羈懷鬱鬱與誰開，久矣江湖賦七哀。僅有一窗延月好，曾無半畝乞

[22] 轉引自 Peter Burke 著・賈士蘅譯，《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頁 25。

[23] 當然，報紙漢詩的刊登，其讀者對象不只是台人，起初更為日籍文人而服務。

[24] 參見高文漢，《日本近代漢文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頁 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花栽。側身天地雙蓬鬢，回首風塵幾酒杯。北望京華空復淚，文章愧少陸機才。[25]

此詩描述旅外羈情，並以曹植〈七哀〉詩自比心境，通篇用典、寫情，實與臺灣漢詩無異，記者粘舜音以爲此詩：「通體詞旨蘊藉，音節和諧。中間兩聯，描出旅居之寂寞，客思之纏綿，恰肖題神。尤妙在無衰颯氣，所謂哀而不傷者，此也。」[26]所以，在寫者、評者的表達皆屬古典文學的慣用模式時，臺人對於日詩便極易將之脈絡化於本地漢詩書寫系統中，如新竹文人王松將閱報所見第一任民政長官水野遵〈送禾原之上海〉詩，載入其《臺陽詩話》中，並推許具有清秀之氣[27]；而做爲中部地區重要傳統知識份子的吳德功，在撰寫《瑞桃齋詩話》時，也留意到當時的《臺灣新報》所登日人作品可誦者不少，遂直接複寫進去其詩話著述中[28]，最終《臺陽詩話》與《瑞桃齋詩話》則又成爲另一類展示日本漢詩的知識體。且正由於臺灣重要文人王松、吳德功的肯定與引介、評述，日本漢文學在臺灣的存在位置就更爲確立、鞏固，容易得到較多臺人的青睞。而此種以報紙作品加上評點的引介日本漢詩的知識建構方式，從日治初期至中後期，皆未嘗改變，這也顯現日、臺漢文接觸，臺人最大的興趣，仍在作品經驗之分享，藉此達成以文會友的目的。

至於另一種詩話體的知識建構方式，因爲本身就具有批評性文學思維，故較具系統性，而其所能承載的日本漢詩知識論也較爲豐富。大抵，這種仲介日本漢詩的途徑，乃利用臺人熟悉的文學批評範式「詩話」來進行[29]，以輕鬆而富有彈性的隨筆體，講述日本漢詩家、詩作的「故事」，在一條條看似不相連綴的條目中，展開「進口知識」的隨後處理，包括編纂、思考、分類和批評。那麼，日本漢文學最終是以何種面目，被注入臺灣的詩學空間與詩學知識系統中呢？大抵，臺人選擇建立與設置新知識的主要方式，是採取「以詩繫人、以人繫詩」的敘述模式，在詩話中散佈、生產大量日人事蹟與漢詩作品論。

以刊載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詩話「拾碎錦囊」爲例，此一詩話的書

[25]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2 年 5 月 13 日第 307 號（二）。

[26]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2 年 5 月 13 日第 307 號（二）。

[27] 參見王松，《臺陽詩話》（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頁 79。

[28] 參見李知灝，《吳德功《瑞桃齋詩話》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2003），頁 179-180。

[29] 除了報紙所刊登的「詩話」對於日人作品有所介紹外，個別作家的詩話專著也不例外，如王松《臺陽詩話》、吳德功《瑞桃齋詩話》、洪棄生《寄鶴齋詩話》，多少都對日人漢詩文有所品評，則顯然「詩話」別具一格的印象式批評思維與表意結構，是時人在吸納、消化、理解日人漢詩文及其文學知識論的絕佳利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寫除由報社記者主筆外，亦接受來稿，而詩話共刊登三百四十五則，時間自明治三十八年（1905）七月一日起，至明治四十年（1907）七月二十八日止，由於連載時間久，在高度曝光下，此詩話內容很難不令人注意。而其中被評介的日本漢文人與詩作，包括內地文壇先賢、時人與來臺者，至少就出現了菅茶山、賴山陽、巖谷古梅、野口寧齋、西山子絅、雨川種子、山田新川、野口珂北、福地櫻痴、末松謙澄、方川越山、笠井隆橋、本田種竹、永井禾原、名久一郎、竹添井井、詠平悟由、石井永久、江木衷、高島九峰、河野鐵兜、伊藤春畝、岩溪裳川、吉田勿來、入田披雲、渡邊國武、長谷川泰、橋本海關、林信天爵、服部擔風、結城蓄堂、澤野章、木蘇岐山、高野清雄、落合爲誠、中田敬義、遠藤瑞雲、三島中洲、土屋鳳洲、太田秋波、中田雪莊、鹽谷青山、荻生徂徠、田口乾三、竹磎森川鍵、富田銕、山本窺園、野崎仙、佐佐木忠藏、山田喜之助、池田索軒、小川平吉、橫澤湘南、石川柳城、入田末男、館森鴻、白水真人、籾山衣洲、木下大東、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三屋清陰、金西大龍、小泉盜泉……等，數量可觀。而從前述日本漢文人身份的分佈情形來看，詩話作者細膩考量了日本漢詩文發展的時間性與空間性問題，因爲除了已故的文壇先賢外，亦同時敘述當時活躍中的內地文人與來臺漢文學家的作品，如此呈現了箇中隱含著想要通盤掌握日本漢詩學歷時性與共時性發展的企圖。

實際上，上列日本漢文人及其詩作表現的介紹，大半是由該報記者臺北文人黃植亭所撰稿，而在詩話中他還讚揚了多位與日俄戰爭有關之名人詩作，如末松謙澄、柴山矢八、禰津恒夫、高野竹隱、山田喜之助……等，對於其人一腔義氣，忠君愛國熱血多所表彰，這說明了其欲在詩學的學術知識中寄寓政治隱喻，意味著某種非純文學的質素亦隨之摻雜進來，甚而或多或少起著干擾原臺灣古典文學知識秩序穩定結構的可能性。

至於，黃氏何以能將外來的日本漢文學予以「知識化」地灌輸給臺人，除了因與日人交際而獲得知識交流機會外，閱讀內地書報雜誌亦是其快速取得知識的途徑，如其執筆的〈拾碎錦囊〉（百九十九）有云：

> 本邦自泰西文物東漸以來，風氣一轉，趨捷徑者，馳之若騖，而漢詩漢文一道，遂等告朔餼羊，尚之者寥寥如晨星。近有名士宮崎來城、久保天隨、上村賣劍、結成蓄堂諸子，慨然奮起，欲挽斯文於將喪，因在東京神田區淡路町，倡設同好會，專以研鑽漢詩漢文為主旨，鼓吹文運，誘掖後進，廣募同志入會，年醵會費金一枚有半。每月刊行雜誌一次，名曰新詩文（案，當作《新文詩》），篇中收載，無非近時人所作妙文佳詩，足以怡情悅性，且加刪改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騭，著議論，談優劣，其裨益於後起者良多也。頃寄來一冊，閱讀之下，不禁大為激賞。……[30]

此段文字，指出其人在取得由內地寄來之《新文詩》漢詩雜誌後，才能概略說明宮崎來城等人創立同好會挽救漢文不墜的苦心，並對該社群之營運及刊物旨趣予以簡介[31]。

那麼，黃植亭是怎樣展現其人從取得日本漢文學「資訊」，到成爲經過深思、處理過而系統化的「知識」過程？他要如何爲日本漢詩及其知識進行塑形，然後重新設計以讓臺人對此知識產生共鳴？大致上，在詩話內容本身，黃氏所進口／轉手的日本漢詩知識，包括詩社團體的介紹、漢詩刊物，但最大宗仍在詩人及詩作的品鑑；其目的或資閒談，或記事，而轉至詩歌文藝美學的評騭。如〈拾碎錦囊〉（百五十二）所言：

> 福地櫻痴，名源一郎，扶桑老才子也，資性宏達，才藻絕倫。嘗投身政界，又從業操觚，晚年選為眾議院議員，精通和漢學，好作稗史小說，尤精演劇之道。著述等身，文辭巧妙，擅英譽於一身，然才氣橫溢，豪放不能自規，縱情遊蕩花街柳巷間，一時有江左第一風流才士之名，由是往往誤身。曾有詩云：「平生心力半消磨，無限雲煙眼底過，昨夜月明今夜雨，來宵情事更如何？」觀此可以知其大概矣！歲甲午，一月五日，以病終，舉世皆悼惜之。[32]

對於福地櫻痴，臺人或知其精擅演劇之道，但不定然知曉其縱情聲色，故此段文字將其詩與放浪行徑合觀，鮮活傳神地表達了「扶桑老才子」的遊蕩形象，也讓臺人分享了福地氏的風流詩篇。

當然，詩話的目的，更側重的仍是揭示日本漢詩寫作的經驗，使臺人有所取法而知金針所在，如下例所述：

> 新詩文（案，當作《新文詩》）第一集，有載小林天龍所作七絕云：「路入白雲黃葉間，溪流一道碧潺湲。有情青女染秋好，紅遍夕陽春處山。」有字號乃公者，謂其：「白黃碧青紅，俱是色字，

[30] 參見〈拾碎錦囊〉（百九十九），文載《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9 年 4 月 7 日第 2377 號（三）。

[31] 關於明治時期此一創刊最早的漢詩文雜誌《新文詩》，的確如黃植亭所言可以「裨益後起者良多」，因為吳德功《瑞桃齋詩話》卷五也提及此雜誌，並且引用《新文詩》中的日人作品加以品評，可見此刊在當時頗為臺籍文人所看重。

[32] 參見〈拾碎錦囊〉（百五十二），文載《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9 年 1 月 21 日第 2315 號（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光彩滿紙，讀之眼眩。唯聞凡詩中多點出地名，即為廣輿記；多點出人名，稱為點鬼簿；多點出數字，稱為算博士，乃作家所忌。然則天龍此詩，多點綴色部字面，何以稱之？可擇一佳名曰：水彩畫、花電車要之。作詩用字面，有一則可，二則不可也，初學者切勿倣之。」此說誠是，足為研究之資。[33]

透過小林天龍之詩，指陳顏色字使用過度乃詩家所忌，更爲初學者之警惕。此外，系統性地整理、敘述日籍文人資料與相關創作表現，也是主要傳播要務之一，明治三十八年（1905）《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拾碎錦囊」（七）有謂：

> 菅茶山先生，本邦碩儒，以詩名世，尤長古體，即為大師家之一，著有《黃葉夕陽村舍詩》十卷，計千餘首，版一出，幾於洛陽紙貴。春水賴翁，其至友也；六如上人，其方外知音也，時相過從，唱和吟詠。春水子子成，即賴山陽，執弟子儀，就而學詩，大得心傳，並為檢閱刻本。其間有〈影戲行〉一首云：「紙障籠燭光輝邃，有物森立含百魅。鬼耶人耶人莫識，疑著豔妝凝珠翠。……觀者悵然惜更闌，一笑製詩傳相示。君不見漢唐事業無踪跡，人間今古幾影戲？」先生去今，已數十年，其詩蒼勁古茂，警闢絕倫，宜乎其膾炙人口，而為後學津梁也。[34]

文中將菅茶山之生平、著作與詩風特色，做「論詩及事、論詩及辭」的表述，除道出其與賴山陽的師徒關係外，更以〈影戲行〉爲例，拈出其人獨特的「蒼勁古茂，警闢絕倫」詩風，雖是簡約的印象式批評，但也在片言隻語間瞬間掌握菅茶山的藝術個性和風格特徵。

實則，透過黃植亭「拾碎錦囊」詩話的系列介紹，或參酌當時報章所載日人作品，可知菅茶山、賴山陽[35]、本田種竹、森槐南等人的創作表現，最爲臺人所知悉與推崇，而其人的詩歌美學也深烙在臺人心中，甚至成爲臺人漢詩寫

[33] 參見〈拾碎錦囊〉（二百），文載《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9 年 4 月 8 日第 2378 號（三）。

[34] 參見〈拾碎錦囊〉（七），文載《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8 年 7 月 13 日第 2158 號（三）。

[35] 賴山陽是日治時期自始至終最為臺人所知悉之日本漢學／漢詩先賢，相關情形參見拙文〈跨界傳播、同文交混、民族想像：賴山陽在臺灣的接受史（1895-1945）〉，（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主辦「臺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06.11.10-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作的新學習對象，進而擴充了臺灣詩歌宗法典範的來源。不過，整體而言，以詩話體式進行日本漢詩知識論的傳播，雖然在作家論、作品論上，已有脈絡化的評介，裨益了臺人的理解與吸納，提供詩歌書寫的借鑑，但由於是片段式的報導，故其所建構出來的日本漢詩知識論毋寧仍屬斷裂而拼貼，缺乏整體而可觀的鳥瞰面貌。換言之，臺人對日本漢詩知識論的關注重心，其實是從創作技巧面向出發的，這與前述報刊藉由每日登載作品以借鏡日人詩篇之妙處，其用心實同。

再者，以「詩話」型態進行日本漢詩知識的生產與傳播，固然得使臺人較有體系地獲致相關知識，但由於詩話中有關日詩與知識論的引介風氣，實以日治初期最盛，到了大正後期、昭和初期之後，由於日本在臺漢文學趨於式微，介紹轉少，僅見少數如刊於《三六九小報》上邱濬川「圓園詩話」對長谷川陸軍大將赴高麗、滿州所做詩歌，以爲「方之唐人出入塞諸作，氣魄猶見沈雄」[36]；而言及蒞臺督憲時，以「蔗庵詩才最爲清妙」，對於曾爲內地隨鷗吟社社員的上山滿之進詩藝持高度肯定[37]。又，如謝雪漁在1935年至1938年間於《風月報》上所撰之「蓬萊角樓詩話」、「奎府樓詩話」，對多位日本漢詩人及其作的品評，包括鹽谷岩山、國分高胤、浪坦煙崖、石川戈定、鷹取岳陽……等。其後，則是在大東亞戰爭爆發後，伴隨著更多日人逸史講談的出現，以及孔教儒學的紹介，1943年友鶴（按：即高雄文人鄭坤五）開始在《南方》第180、181合期上開闢「蓬萊清籟」專欄，逐期刊載日本漢詩，並進行相關作者的生平簡述，至此才又見較具規模地以詩話方式賞鑑日本漢詩。依鄭氏文中自序所述：

> 漢詩為文學附庸，昔人或嗤為雕蟲小技，然學之者，非十年不成。余自少便喜涉獵，至今五十餘年，尚一無所得，其難可知矣。……乃內地人士，不憚攻他山之石，多善漢詩，每有驚人傑作，膾炙人口。……夫專惜漢詩，學漢詩尚覺其難，況素昔讀法不同之和文學者，傍習漢詩，豈不難之又難乎？自吉備真備氏遣唐歸國後，代有名人，至明治聖代，更人才輩出。……余生也晚，未能遍讀諸公佳什，常引以為憾，然幸天性愛玩名人墨寶，每從古董詩畫，寸縑尺素中，得拜觀群賢手澤，……日積月累，久而成帙，雖網羅不富，亦足窺豹一斑。吉光片羽，愈堪珍貴，……咳唾珠璣，敲戛珠玉，不但作風聲調，絕無和文習氣，而且置諸唐宋集中，亦所難辨。暇時略一展誦，亦覺神清氣爽，……不忍韞櫝而藏，將付聚珍，以供

[36] 參見《三六九小報》昭和 6 年 11 月 26 日第 131 號，頁 4。

[37] 參見《三六九小報》昭和 8 年 3 月 1 日第 266 號，頁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好。……名之曰蓬萊清籟，蓋以為鈞天逸韻全非凡響者也[38]。

此處道出鄭氏撰稿的動機、所錄日本漢詩資料的來源，以及其對日本漢詩藝術的肯定。往後便以詩話方式，陸續於182、184、185、186、188等期刊登日人漢詩作品，而所載日人包括梁川星巖、伊藤博文、乃木希典、三島中洲、杉聽雨、巖谷一六、中林竹洞、十時梅崖、長三洲、野田笛浦、村籟栲亭、巖穴祝溪、小野湖山、村田香谷、齊藤拙堂、清浦奎吾、橫井小楠、雲井龍雄、賴山陽……等。由於《南方》後來改爲《南方詩集》，受制版面與篇幅，「蓬萊清籟」對於日本漢詩的評述也就嘎然而止了。因此，大致看來，後期臺人詩話要如昔年黃植亭積極從事日本漢詩的進口／轉手知識的榮景，已不復見；而即使後來，現代「文學史」概念的出現，臺灣也未見針對日本漢詩史的發展，做出文學史式的書寫，終究無法對日本漢詩的傳承及相關現象，做出解釋和總結，所見者是報上作品的刊載或簡單印象式批評而已。這樣的現象，指出了臺人雖在日治初期便大量接觸日人漢詩作品，但對日本漢詩的關注，其感知興趣仍在作品本身，而不是文學史知識的獲得與吸融；換言之，審視日、臺漢文的跨界關係性，臺人對於日本漢詩及其知識論所能吸收的面向，主要仍在作品寫作美學的觀摩與學習。

四、「風雅」論及其他：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轉變／轉換

隨著日本漢詩漸爲臺人所知悉，在接觸、認識之後，臺人會如何看待此一異族之「同文」表現？當日、臺間的漢文學出現交混、交流之現象，則臺人會對自我的漢詩作出何等評價與認定[39]？臺灣漢詩之主體性，是否會在日本漢詩之滲透下，產生本體的搖撼、消解？實際上，在日治初期，已有將內地漢詩與臺灣漢詩作一比較的「區辨」聲音發出，載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之〈讀酒樓詩話〉（二）有云：

[38] 參見友鶴〈蓬萊清籟〉，載於《南方》第 180、181 合期，頁 39，昭和 18 年 8 月 1、15 日。

[39] 本文以下論及了臺人評價日本漢詩之事，至於日人有關臺灣漢詩、漢文學表現良窳之看法，筆者所撰〈殖民地時期日人眼中的清代臺灣文學〉一文曾加討論，文見許俊雅主編《講座 FORMOSA：臺灣古典文學評論合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頁 195-237；其次，若干日人為臺人作品集所寫之序跋文字也有所觸及，唯此部分資料尚待更全面的蒐羅與釐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內地人詩，自帶倭臭；臺灣人詩，亦自帶固有之臺臭。內地人讀本島人之詩，未能悟其妙處；本島人讀內地人之詩，常覺其俗氣撲鼻。[40]

原本，江戶時代對漢詩給予一種很高評價時，會使用「無和臭」一語，此處執筆者似乎略加改易，乃以「倭臭」與「臺臭」來區別日、臺漢詩各自的獨特性與侷限性；而從上述品評中，顯露了其人對於日、臺漢詩有著一定的認識程度，才能瞭解雙方詩作特質，且指出雙方各有所好的事實，以爲內地人不能識臺詩之妙，而本島人亦覺日本漢詩俗氣撲鼻。如此，則或可見日本領臺初期的漢文交流關係，固然有如黃植亭的鼓動推介，但也有如本則〈讀酒樓詩話〉所示，對部分臺人而言，雙方的「同文」互動，其實是在某種「距離感」中進行的，甚至在「同文」中看見「異」，在發現「他身」後更發現了「自我」。

但相對地，也有臺人在接觸日本漢詩後，以爲臺詩不如日產，如莊玉波在爲北臺第一大詩社「瀛社」副社長謝雪漁《詩海慈航》一書作跋時，提到謝氏對於日本漢詩讚不絕口，該文如下：

> ……拙曾寄雅文會月誌於吾社長（謝雪漁），承寄書褒獎，且言母國人士之詩，立意清新，措辭工雅，非從唐人之詩入手，不能得如此之精妙。吾小美麗洲人，多不知取法乎上，詩風靡靡，愈趨愈下，群尚擊缽吟體，且多取材於報紙，殆不知唐宋元明為何代？李杜歐蘇為何人也？……[41]

據莊氏轉述，謝雪漁以爲內地「雅文會」諸子詩作，由於取徑唐詩，故能遠逸取材報紙、專尚擊缽吟體的臺灣漢詩，並強調方法論之異，導致日、臺詩風的良窳之分。

以上的例證，指出了時人在解讀日、臺漢文接觸關係時的知識論，至少出現過日、臺漢文各具其「臭」的本體平等論，以及認爲臺詩現況遠遜日詩的表現差異論，不過如此的評價是較爲靜態的文學論述；另一個更待動態考抉的是，雙方對於漢文交流的精神感受與互動過程的理解狀態。

大正十五年（1926），臺北瀛社首任社長洪以南在上山滿之進總督邀請國分青厓、勝島仙坡來臺[42]，並柬邀臺島文人參與的官邸詩會上，代表島人述

---

[40] 參見〈讀酒樓詩話〉（二），文載《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9 年 7 月 20 日第 2466 號（三）。

[41] 參見莊玉波，〈詩海慈航跋〉，文載《風月》第 22 號，昭和 10 年 8 月 19 日。

[42] 勝島仙坡是帝大名譽教授獸醫學博士，而國分青厓則是日本大正及昭和前期最負盛名的詩人，曾任大東文化學位的教授及《昭和詩文》雜誌顧問，被推為雅文會、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謝，他公開表示：「余等夙與在臺之內地人詩人切磋研磨，文字之契，爲極真誠而無僞也。[43]」。此言容或存有幾分應酬意味，但其特意強調「極真誠而無僞」，則也難以通盤否定，對某些臺人而言，日籍漢文人是可以一同分享操筆染翰之樂的文字契交，這與洪棄生在明治二十九年（1896）時，痛批「孔廟儒林受殘毀，書生秀士遭苦辱，而民於是絕望矣[44]」的情境，有著天壤之別。何以，文人精神感覺結構如此迥異？而我們或許要還進一步追問，從日治初期到大正末期，日、臺政治／文學／文化關係的變化，「漢詩」究竟發揮了何等效能？對此，以下將從日本治臺時挪用中國傳統儒家實用文學觀中的詩大序詩論，藉由此一亦爲臺灣漢文人所熟悉的文學思想資源，用來進行溝通、鼓舞日／臺漢文交流的知識資本談起，並觀察雙方關於「風雅」及其他知識論轉換／交換的思維演繹過程。

風、雅，原屬《詩經》六義，是詩歌之類型，迄梁蕭統〈文選序〉中「故風雅之事，粲然可觀。」首將風雅二字連用，用以指稱「詩文之事」，遂爲後世所沿用。但另一方面，源於《詩大序》而來的風、雅之義，由於隱含風教理想的深刻解釋，更是影響深遠。文章有言：

>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劉若愚在解讀此段文字要義時，以爲：一方面，它從統治者的觀點，規定出詩

社、蘭社、興社等詩社、文會的盟主，是引領一代風騷的領袖人物；上山滿之進加入詠社後，曾師事國分青厓。關於此次總督上山滿之進邀請兩位當時日本內地著名詩壇巨匠來臺之事，固然有期許「深信將來於本島文藝上，抑為內台人親善起見，有一番好影響。」（參見《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5 年 12 月 1 日第 9549 號（四））。但也不無有著宣示日本漢詩正宗及確立典律性的儀式化意味。

[43]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5 年 11 月 30 日第 9548 號（四）。

[44] 語見洪棄生，〈代友答日儒問清官日官利害（丙申八月初九旦走筆）〉，文見氏著《寄鶴齋古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1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它也從臣民的觀點描述詩的政治作用[45]，所被強調的就是教化觀念。所以，詩歌因爲具有感人的力量，遂被賦予了化成德行、改造風俗的功能；又由於詩歌與政教良劣密切相關，「風」旨教化，而把人與政治聯繫起來；「雅」求其正，又將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相繫，故能知王政興廢，但相對地則有「變風」、「變雅」的衰世之音出現。[46]

日本漢詩淵源於中國，《詩大序》的詩歌實用功能論亦曾傳至東瀛，然而「風雅」之義卻逐漸發生流變，其中以元祿年間（1688-1703）伊藤仁齋的人情《詩經》觀，最具日本特色。由於元祿時期，俳諧、小說、演劇等市民文學獲得發展，人道主義思潮高漲，伊藤氏大倡「詩道性情」的人情詩觀，表達了對日人向來承繼的朱熹勸善懲惡《詩經》觀的背離。他把詩當成一種「雅玩」的遊戲，是山林隱士、遺世之民遣愁解悶的興趣愛好，不認爲詩有服從政治的企圖與法力，將新的《詩經》觀與日本淵源流長視詩歌爲遊戲的觀念有所承繼與發揚[47]。是以，在經學《詩經》觀向文學《詩經》觀轉換之際，「風雅」精神與意涵也產生變化；改變後的日本「風雅」精神，李東軍言簡意賅地指出：「失去了『風人之旨』的諷刺含義，也偏離了『雅』的本義，即遠離了社會與政治問題，片面地強調作品的『優美、典雅』的藝術風格，尤其是到了近代，儒教詩學的影響幾乎消失殆盡了。[48]」所以，一般日人不將風雅精神與政治、國家問題相聯結，以爲藝術要與現實保持距離，否則文藝作品便失去高雅，而創作乃爲得到精神的享受與美感的滿足[49]。

此等愈到近代愈加側重精神愉悅的「風雅」美感經驗，當日人治臺時，亦將之引入臺灣，並予以推廣，如初期日人水野遵、土居香國等人創設之「玉山吟社」，每於公餘之暇便集結臺北本土人士一起拈韻賦詩，當時參與的臺人便以「文采風流」稱譽日人之高尚詩篇與優雅情懷，而以「吟社風流」頌揚詩會之高尚興味[50]；故歷來原有多義的「風流」一詞，此處所強調的是作品、詩人

[45] 參見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臺北：聯經出版社，1985），頁238。

[46] 以上有關詩大序意義之解說，亦參王金凌，《中國文學理論史：上古篇》（臺北：華正書局，1987），頁 163-167。

[47] 關於伊藤仁齋《詩經》觀的突破意義，參見王曉平，《亞洲漢文學》（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頁 190-196。

[48] 參見李東軍，〈風雅考——中日古代詩學比較〉，文載《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3：4（2003.7），頁 113-114。

[49] 參見李東軍前揭文，同上註，頁 115。

[50] 參見《臺灣新報》明治 31 年 4 月 6 日第 469 號（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詩社群體獨具的高雅情趣，顯然頗爲契合日產的「風雅」一詞之旨。又如，明治四十五年（1912），由臺南人士趙雲石、黃茂笙及日人坂根十二郎、上田孫三郎、德田多喜丸……等人所發起的「采詩會」，預計招收會員一千人，所定會章有三：「其一，在鼓吹漢詩，以企東洋文學就將；其二，高尚感興，以令人情優美之機關也；其三，吟詠花鳥風月山水世況，以資風流社交之娛樂。」[51]從詩會會章來看，所謂「高尚感興，令人情優美」的詩歌功能，以及「以資風流社交」的聯誼功能，其所標榜者實是「吟社風流」的風雅意緒。在如此的情境下，時代的風雅氣息更加熾烈，社會趨於「文學化」[52]，深爲時人所讚嘆與津津樂道，洵然一風雅年代也[53]。

只是，當風雅精神愈被強調，詩人「風流」形象愈受看重，詩歌一躍成爲高尚娛樂後，詩歌的「風流社交性」竟也隨著臺灣各地詩社林立（個人目前統計共有三百七十個以上）而變本加厲，則原本漢詩所具有的延續漢文於一線的神聖性、尊貴性，漸遭消解、稀釋。甚至，在高尚感興、優美人情目的下，爲榮耀自我的社會地位身份而進行的過度消費／生產的漢詩，最終指向了娛樂化、媚俗化，卒使臺灣漢詩在某一程度上，失去了更多文化抵抗的資本。

然而不僅於此，日人更適切運用了中國的風雅奧義，來進行臺灣漢詩的教化論，在日人首倡的玉山吟會相關盛會訊息中，便毫不諱言地指出，日治初期若干官紳與臺人聯爲一氣、召開詩會，其意乃爲「藉作輶軒之採，而觀風問俗」之用，具有「省風問俗」之心[54]，這正可見中國傳統儒家詩教稼接日本帝國主義後的在地演出之側面。是以，殖民者塑造出一連串如「風」、「雅」、「文雅」、「淳雅」、「風雅」、「大雅」……等字詞，在相互凝結、推展下，宛如編織出一張兼具詩歌教化、高雅品味的迷人文學網絡，層層包覆著臺人，爲打造一個新漢文想像共同體進行著「舊語言，新模型」的修辭工程。爲此，筆者乃將圍繞著「風」、「雅」而生的各式語彙及其語意的牽延

[51] 文載《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5 年 2 月 21 日第 4213 號（五）。

[52] 拙文曾以「社會文學化」、「文學社會化」來形容日治時代的文學與社會互動現象，而其主要的導因就是漢詩創作的普遍化與庸俗化，參見〈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文載《臺灣風物》47：3，1997。

[53] 關於詩歌或詩社活動「風雅」氣息的美感經驗如何進入或影響臺人的身體感覺結構及日常生活樣態，可以參見拙著《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第三章〈實踐與轉化——日治時代臺灣傳統詩社的現代性體驗〉「審美、休閒與文化消費：傳統詩社的『通俗化』面向」，頁 157-162。

[54] 參見《臺灣新報》明治 31 年 4 月 6 日第 469 號（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efer）系統，統稱爲「風雅」話語（discourse）。

那麼，當日、臺文人在諸多公開場合或報章輿論中所經常提及的「風」、「雅」，成爲日治時期日、臺間漢詩關係的重要「話語」時，則日人或臺人對此會如何加以闡述、理解？報章中觸目可見的「挖雅揚風」、「挖揚風雅」、「鼓舞風雅」……話語，所指是何等文學／社會景象？而「風雅」話語之提倡，到底流露了怎樣的文化現象與思想意涵？臺北文人林佛國〈詩人之天職與社會〉一文，道出了其人的觀察與體會：

> 溯自改隸以來，歷代總制方伯以及縣令，如兒玉藤園伯揚文之會，南菜園之集，後藤棲霞男蒿松閣之篇，村上前臺北縣知事江瀕軒之什，櫻井前新竹縣知事古奇峰之詠，與夫前長官內田竹窗先生南薰之集，是皆在位者倡之於上，而在野如淡社諸人，允力和之於下；降而有瀛社諸人，以聯如今日之各社也。推其意也，無一不在鼓舞風雅，振作末學矣。……夫詩之有裨益教化，古今中外言之者眾矣，然腐儒、俗儒不善用之，……本邦如森博士槐南，所以受知於伊藤春畝公，而大名鼎鼎傾動一世者，非深得於詩學，何可得乎？夫春畝公之厚遇詩人，其意不外教國人，本詩學以陶冶其性情，而大其作用，為忠良之臣民，使中興之景運乘之久遠耳。今閣下之為此舉，豈有他哉？閣下之言曰，發表意志，莫優於文字，文字契合，一見如故，凡為詩人者，能體此以融合，以疎通，則所謂共同一致，諒解同情者，何之而不可乎？……凡自命為詩人者，誠各見其大處，知其妙用，宏修經世實學，砥礪仁義道德，……重其清高之天職，以全其於社會之使命。安在古今中外人之不相及乎？[55]

本篇文章至少凸顯了兩個重點：其一，明治、大正時期以來，日本官方、民間以及臺灣瀛社的種種詩會活動，有其「鼓舞風雅」的目的性，且相互形成了一個文學政治協力機制；其二，作者強力標舉詩歌的教化作用，肯定詩人具有自我修養、參與改造社會的職責與任務。於是，由於「風雅」之必要性，臺灣漢詩人的身份地位被大大提高了，且詩歌的風雅遂與身體之教養息息相關，而不僅是原先高尚審美經驗的強調而已。一旦詩人的身體教養論，是要爲日本政權所服務、奉獻時，則自然不免淪爲殖民帝國身體馴化論的觸媒與養料了。

果然，隨著「風雅」之說愈爲日人所重視，依附其上的思想與觀念，產生

[55] 文章原載《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0 年 10 月 26 日第 7688 號（五），未署名；後見收入林佛國，《長林山房文集》（臺北：林珮貞自印本，1984），頁 213-214，而知作者身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了更多的裂變情形。大正十三年（1924）內田嘉吉總督招宴臺灣全島聯吟大會詩人的一席話，最能顯露其中話語改造的推衍過程，其言經劉克明譯述如下：

> 詩者志也，所以序無邪之志。日本和歌、西洋之詩，亦莫不然，竝可分為美術之詩與夫力者。美術之詩，觀其措詞，其麗以則、含婉有章；力者則可覘國家之隆替，民族之興衰。是故剛健之詩，足以涵養建國興隆之思想。余曩官臺灣，亦嘗與本島詩人唱和（指南薰集），今茲重來，更望列位，提倡風雅，並寄興於本島統治。而昨日之聯合吟會，是日適前一年為皇太子南巡中，行啟草山，覽賞八角蓮之日，吟會席上，特以「八角蓮」命題，各抏（原文誤作「挖」）風揚雅抒寫其志，所望列位深體殿下所賜綸音中「和衷協同」之旨趣，而有所副焉云云。[56]

內田總督開門見山所言的「詩以序無邪」之志，本亦自詩大序精義而來，並無新意，唯後面所論，相較上引林佛國發表於大正十年（1921）將詩歌教化論與詩人修養論並思的情形，總督「提倡風雅」的目的，更在「寄興統治」，尤其舉出剛健之詩更能涵養建國興隆的思想，這其實是將中國詩大序的詩論，置換精魂，給予殖民地化。所以，他更公開要求臺人應體悟日本殿下所謂「和衷協同」之深意，漢詩的書寫竟要能爲日、臺之齊心協力做出見證任務了，詩歌已然淪爲政治附庸。

因此，日人的風雅「話語」實際有著清晰的文學政治操作技術與修辭邏輯，導致臺灣漢詩的工具性色彩愈加明顯；而在日人極力抏雅揚風之後，日、臺漢詩書寫風氣愈加熾熱，臺島社會洋溢一片風雅氣息。吟風不歇的結果，社會充滿風流／風雅／雅馴／馴化，也就真有了「和衷協同」的氛圍，彷彿締造出昇平盛世的景象，而不絕於耳的詩音自是太平之音。所以，大正十年（1921）讓山總督與全島詩人在官邸聯吟的作品，薈萃而成的詩集，便命名爲《大雅唱和集》，蓋欲以「大雅」表盛世雍容之音；而鷹取岳陽〈大雅唱和集序〉，也標榜此詩會詩作「實一代盛事也」、「真可謂震鑠古今者」[57]。

相較於日人之將「風雅」、「大雅」聯繫並觀，以顯豁當下的文治政績，臺籍文人連橫雖然同樣也看重詩大序的「風雅」教化功能，卻更留意於所謂周室衰微、王綱解紐時代產物的「變風、變雅」問題，且以爲明鄭以來迄今的臺灣詩歌，實屬「變風、變雅」之史編，其恰恰亦寫於大正十年（1921）的〈臺灣詩乘自序〉，以忉怛慘惻之心作了如下結語：「是詩是史，可興可群。讀此

[56]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3 年 4 月 28 日第 8602 號（六）。

[57]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0 年 11 月 14 日第 7736 號（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者，其亦有感於變風、變雅之會也歟！[58]」則日治時期的臺灣漢詩，究竟該是亂世之音或盛世之音？連氏「變風、變雅」之語，格外耐人尋思。

而另一位鹿港文人洪棄生，當其面臨沸沸揚揚的日本「風雅」論時，其回應方式，則毋寧是選擇將寫於明治二十九（1896）年到大正四年（1915）間的〈寄鶴齋詩話〉[59]，刊載於大正十三（1924）年至十四年間（1925）的《臺灣詩薈》上；詩話內容旨趣有二：其一，如同連橫般對「變風、變雅」極度重視[60]，其二則是「回歸《詩經》的風雅傳統」[61]，後者相較當代詩話論述極具復古色彩。故洪氏之舊作新刊，由於其對《詩經》風雅傳統的高度昂揚，遂與日人在臺極力賦予的「風雅」新義，形成詮釋的極大反差。吾人或可逆測洪氏之所以於臺人頗爲重視的《臺灣詩薈》上發表舊作，不無特意標誌、再確認「風雅」論之正統性，進以曉諭臺籍文人「風雅」論的真諦，而與日人之詮釋系統交鋒、角力，產生頡頏、對峙的作用。

除了上述之外，與日人「風雅」話語攸關者，尚有一個值得留心的焦點，即詩歌與「國民性」的問題。既然日人看重臺灣漢詩促使日、臺親善的疏通融合功能，而臺灣詩人也能力求實踐教化身體、致力改造社會，則臺灣漢詩能否與「國民性」議題有所接軌？而這又將會產生何種型態的文學知識論呢？

由於「國民性」[62]一詞，所指爲日本之國民性，所以臺灣漢詩之欲承載日本國民性，無疑會混淆日、臺文化位階與界線的問題。對此，早在大正四年（1915）四月五日，擔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的漢詩人魏清德，便發表了一場題爲「詩及國民性」的演講，而後他將演講內容摘錄於《臺灣日日新報》

[58] 參見連橫〈臺灣詩乘自序〉，文見氏著《臺灣詩乘集》（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5），頁 1。又，此處標點原作「其亦有感於變風，變雅之會也歟！」有誤，逕改之。

[59] 洪棄生詩話的撰寫時間，依據陳怡如《回歸風雅傳統——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2005），頁 35-37。

[60] 參見陳昭瑛〈儒家詩學與日據時代的臺灣：經典詮釋的脈絡〉，文見氏著《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臺北：正中書局，2000），頁 267。

[61] 參考陳怡如前揭文之研究所得，故其以「回歸風雅傳統」為論文之標題，以凸顯洪氏詩話之特色。

[62] 「國民性」一詞源於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現代民族國家理論，是英語 national character 或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的日譯，在十九世紀歐洲種族主義國家理論中，國民性概念曾經十分盛行。此一理論的特點是把種族和民族國家的範疇作為理解人類差異的首要準則以幫助歐洲建立其種族和文化優勢，為西方征服東方提供進化論的理論依據。參見劉禾著・宋偉杰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2），頁 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其文如下：

> 國民性之消長，詩亦與之消長。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敷島の大和心を人間はば朝日に匂ふ山櫻花）此詩具有日本國民性之表見，漢詩數千年作者不少，可惜無國民性表見之詩。此後所宜改良者，為排去陳腐，應時勢之要求，詩之本領，不獨為精神界之慰安，將以高尚國民之品性，改造國民之精神，不然則作詩不如耕田。內地人之格言，余亦深贊成其說……。[63]

魏氏首先言及文學與國民性的對應關係，演講中他特別引用了本居宣長的短歌「日本的大和心，清晨聞到山櫻花」，以櫻花的植物象徵譬喻日本國民性，藉此呼籲改革臺灣漢詩的陳腐，希望漢詩可以成爲提升、改造臺灣國民性，乃至於形塑出日本國民性的利器。於此，不難想像魏氏對於臺灣漢詩國民性精神的表徵性，是抱持肯定與期待的心境。不過，參酌當時發生在臺灣，集中在「漢文」教育或「漢文」本身能否做爲國民性載體的多次論爭[64]，陳培豐近期研究的結論指出：「相對於『國語』以及和歌俳句被認爲是涵養日本國民性的唯一管道；漢字、漢詩文則增強了『他者性』的色彩，而變成了一種足以讓統治者利用的工具」[65]。

面對這樣的結果，其關鍵在於日本漢詩與臺灣漢詩本質依然有所差異，由於「同文而不同調」[66]，漢字雖同，但閱讀方式有別，日本採用了音訓結合、顛倒詞序的日本化讀法，且發明了相應的標識方式，這與臺灣漢詩讀法全然不同，就此也證成了，被殖民的臺灣漢詩無法轉換／交換成日本漢詩的身體，自然也就無法承載國民性的精魂了。所以，觀察日治時代由日人所成立的詩社，雖會邀請臺籍漢詩人參與盛會，進行親密交流，但其社員大抵仍是日人；即使到了臺人國語程度較佳的昭和時期，以久保天隨所創設的「南雅吟社」而言，臺籍文人亦僅魏清德一人而已。以上的現象，暗示了日、臺間的漢文關係，雖能因同文而有所交流溝通，但卻也因不同調而實際分流。而對於日、臺漢詩「同文不同調」的距離感與違和感，由於昭和十二年（1937）中、日戰爭爆

[63] 〈大正協會例會〉，《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1915 年 7 月 8 日。

[64] 關於此部分之觀察，陳培豐，〈日治時期的漢詩文、國民性與皇民文學——在流通與切斷過程中走向純正歸一〉有詳細剖析，同註 4，頁 475-483。

[65] 陳培豐語，同上註，頁 483。

[66] 陳培豐前揭文較早注意到此係臺灣漢文與日本漢文間的重大差異，洵屬該文極為精彩的觀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發，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打，更爲臺人所關注。

在這個關鍵時刻，臺灣漢詩能否鼓勵國民精神作興，擁戴尊嚴精華的國體，成了若干臺籍文人所迫切反省與亟待解決者。此時，原創刊於昭和十年（1935）五月的《風月》雜誌捲土重來，易名爲《風月報》，改由謝雪漁出任主編，號爲「風月中興」，謝氏遂在新轉型的《風月報》上增列了「國語讀詩法」一欄，且刊出鼓吹日人吟法的文章，如卓夢庵〈日本詩吟〉：

> 漢詩之流入我國，始自欽明朝，正值盛唐詩學大家輩出之路，於是我邦人士，多有學之者。建武中興，詩人特盛，……，是時幕府專橫，皇室政令不行，志士仁人，傷心時事者，多慷慨激昂，託情風詠，藉以鼓舞士氣，而致忠君愛國之誠。……由是以來，數百年之間，吟風不絕。至賴山陽先生時，勤王家又多出於詩人，其所題作，或介或狷，或怨或蕩……。噫！詩之感奮人心者有如是。……顧臺灣之今日，詩社林立，揚風扢雅，歌頌昇平，亦抑可喜之現象也。然余卻感美中不足者，何則？能詩之士，大半致力於推敲，而於吟詩，多漠然置之度外，鮮有學吟者，故在騷壇廬唱之士，音節聲調，區區不一，人異其吟，句乖其旨，抑揚頓挫，失其自然，拮屈聱牙，殊難入耳。母國人士，作詩者雖不及島人多，然吟詩有法，累世相承，聲調如出一轍，今雖分有三派，然亦不過大同小異耳。譜諸琵琶者，曰琵琶派；合劍武而詠者，謂之劍武派；最近帝都人士，盛行吟詠，依詩之意，而吟各別其高低之音調者，謂之朗吟派。……最近都人士，以詩尤可以鼓吹國民精神之作興，……學之者日眾……，臺灣之莘莘學子，盍闔就而學焉，則於漢文衰頹之今日，亦不無稍有裨益也。茲將詩吟法錄下，付以五十音，可藉知其訓讀之法。……而嘆吾臺之詩人，尚未得朗吟之真詮也。[67]

這篇略具日本漢詩小史[68]的文字，顯現了卓夢庵對於日本漢詩發展梗概實際有所掌握與認識，文中具體指陳了「吟」的作用與價值，利於鼓舞、凝聚日本民心士氣，就此度過多次時代巨變；其次，則言及日本吟詩之法的派別，乃至當前日人漢詩中興的氣象，最終以爲臺灣詩壇，在漢文衰頹的情形下，臺人應改習重視吟法的日式漢詩，才能獲致改善機會。大抵，卓文既能留心日本吟詩的歷史意義，又企圖兼顧當前日、臺時勢所需，故能清楚表露出身臺籍的卓氏，

[67] 參見夢庵〈日本詩吟〉，文載《風月報》第 45 號，頁 8，1937.7.20。

[68] 在前述臺人以詩話體的進口／轉手日本漢詩知識時，曾言及臺人缺乏具有現代的文學史觀念去綜覽、評述日本漢詩發展梗概，故如此處卓夢庵此文者仍屬罕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日本漢詩知識論已有可觀之處，或足以見日、臺漢詩交流有成；然而，當臺灣古典文學知識論，從「同文」論轉爲「同調」論時，其間的質變與衍異，也就不言可喻了。

故進入大東亞戰爭以後，昭和十七年（1942）五月黃純青、簡荷生聯名正式發起「漢詩研究會」，希望以漢詩發揚東洋美德的忠孝精神，以盡詩人文章報國之義務，且在成立宗旨中強調「願振興詩教精神，發揚忠孝之美風」、「願青年詩人以國語吟漢詩，養成古武士之風格」、「願體三百篇風人本旨，寫社會真相含有時代精神」……等[69]。細繹「漢詩研究會」的成立宗旨與創作旨趣，彷彿可見臺灣漢詩逐步朝向日本漢詩邁進的形構軌跡，從早年國民性反映論或本質論的追尋、建構，迄今日本忠孝精神的發揚與寄寓；從漢字「同文」到國語吟讀的「同調」宣示，以及更向時代精神與國策靠攏的「風雅」論，臺人最終走向了「吟詩報國」的同化表態之路，致使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成了政治認同的實踐。

不過，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與認同政治的勾連，雖在1937年後，尤其是大東亞戰爭後躍升爲臺灣文學的核心主調，但不能否認的，與黃純青、簡荷生「漢詩研究會」名稱相近似的，稍早之前的昭和十五年（1940）十二月，由林獻堂帶領櫟社社員及霧峰當地青年所組織的「漢詩習作會」，卻是試圖維繫住臺灣漢詩原汁原味的書寫型態，此從該研究會的詩歌命題未若「漢詩研究會」的緊扣時局，以及內容書寫仍不乏隱寓批判、不滿可知[70]，這是戰爭期時臺、日間漢文戰爭的另一側面。

五、結語

由於漢字的「同文」因緣，日、臺間的文化流動與文學對話理應顯得親近，但因殖民陰影的籠罩，在相互交往的全球意識成爲當代文化意識的核心這種趨勢推動下，要回溯起1895年至1945年間這段曾經發生過的漢文互動關係，不免顯得有些措辭齟齬與緊張流露，因此觀察視野中便難掩皺褶之處。

---

[69] 參見黃純青〈漢詩研究會創立公啟〉，《南方》143 期，昭和 16 年 12 月 1 日，頁 17；簡荷生〈漢詩研究會成立啟事〉，《南方》150 期，昭和 17 年 4 月 15 日，頁 44。

[70] 參見廖振富，〈皇民化浪潮下的文化抵抗策略：論太平洋戰爭期間的櫟社活動及其創作〉，「皇民化與臺灣（1937-1945）臺日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日本拓殖大學主辦，2006.5.13），頁 8-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爲了打開皺褶，本文選擇從一種較開放性的跨界文化流動面向著眼，去掌握日本大和文化與臺灣漢文化間，透過「漢文」中介所進行的文學流動現象以及各種可能的「關係性」。但誠如孫歌所說：

> 跨文化不可能發生在兩種文化之間，它恰恰發生在一種文化之內。也就是說，當一種文化內部發生了對於自身自足性的懷疑時，跨文化才可能發生。在這種情況下，異質文化的媒介作用，只有通過本土的知識狀態才能夠產生，而一旦異文化的問題真的成為自我認知的媒介，那就意味著本土知識狀態發生結構性的改變。[71]

跨文化研究的真正焦點仍然是鎖定一方而已，只是在兩方接觸中更看清自我的鏡像。所以，本文要討論日、臺間的漢文跨界接觸與流動，不在膨脹兩地的文化廣度與受容能力，相反地，本文恰恰是經由從日本到臺灣，又從臺灣看日本，這一來一去間，才更清楚看到臺灣在流動過程中所重新發現的主體認知的新可能性。

那麼，以日、臺間的漢詩及其相關文學知識生產爲問題軸的考抉，將會明白什麼？日本的漢詩，對於殖民地時期的臺人而言，究竟有何意義？而源於異族統治而來的同文／漢文接觸關係，又會產生怎樣的文學交流、接受反應與政治想像？當吾人以新視角細思這段日、臺間的漢文活動史，可以發現經由報章的作品刊載，以及其上「詩話」的轉介，日本漢詩成功進入了臺人的視域中，臺灣漢詩獲得另一種新的創作學習來源，以及新的技巧與美感經驗的分享，漢詩及其知識論的邊界隨著開放、不固著而變寬。至於，選用詩話的隨筆體式做爲引介新知識的方法，或是對作家論、作品論的特別關注，非唯凸顯了觀看日本漢詩的獨特方式，其實更是顯現了臺灣自己當時漢詩知識論的需要與問題所在，這既可瞭解臺人漢詩知識論的累積、建構傾向，也了然於其間因知識慣習所帶來的侷限性。

再者，日本漢詩的來臺，它不僅成爲學術討論的對象，更成爲統治臺灣的思想資源；所以日本「漢詩」的輸入，不只是日式漢詩的輸入而已，更伴隨著依附其上的思想與觀念的移植、轉化、傳播、流通，如此遂產生與起始端不同的知識再現與建制化過程。以「風雅」詩論而言，這既是一個詩論，但對臺人而言，也同樣是一「話語」運作。因此，一方面，日本致力推展其日式的「風雅」美感精神，促使臺灣挖雅揚風，塑造出一個具有高尚興味的清雅社會，臺人沈醉於詩歌風流，並欲藉此抬高自我品味與身份地位；但另一方面，則是進

[71] 參見孫歌〈跨文化知識狀況的思考〉，收入氏著《主體彌散的空間——亞洲論述之兩難》（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頁 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行中國風雅教化詩觀的挪用與再詮釋，尤其是在與國家殖民主義有所稼接後，「風雅」話語充當統治者的意識型態工具，且在訊息傳遞過程中，暗含了權力的施加和承受的意義，相形之下，便會壓迫到臺灣漢詩的生存空間與主體位置，並使其產生變形。

於是，「風雅」話語與詩人教養／馴化、和衷協同的親善任務相連結，或是詩歌與國民性問題的延伸探討，同文不同調的區辨或試圖改變，乃至漢詩吟詠忠孝精神、吟詩報國等目標的落實，指出了日本漢詩的優越位階以及臺灣漢詩的離心與邊緣化的形成，臺灣古典文學知識系統的秩序性受到挑戰，在重構與衍異中更看到臺灣漢詩掙扎與迎合的姿態。當然，必須正視的是，在決定不斷地追隨日本漢詩中，放棄自我者有之，但也有在不斷抵抗中獲得自我的更新者，連橫、洪棄生對變風、變雅作品與詩論的展示或重視，林獻堂「漢詩習作會」選擇昂揚的走著臺灣漢詩的原路，正是說明了日本漢詩對臺人而言是思想，是審美，是行爲，是政治，催生了臺灣漢詩不斷流動的影子和自我更新的空間。未來，繼漢詩問題的探索後，日、臺間的古典「漢文」問題及對其相關知識狀況的思考，將會是下一個亟待釐析的研究對象。

（責任校對：楊雅儒）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專書

王松，《臺陽詩話》，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王金凌，《中國文學理論史：上古篇》，臺北：華正書局，1987。

王曉平，《亞洲漢文學》，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羊子喬編，《郭水潭集》，臺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94。

林佛國，《長林山房文集》，臺北：林珮貞自印本，1984。

洪棄生，《寄鶴齋古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5。

吳德功，《瑞桃齋詩話》，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高文漢，《日本近代漢文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

許俊雅主編《講座FORMOSA：臺灣古典文學評論合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

孫歌，《主體彌散的空間——亞洲論述之兩難》，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陳昭瑛，《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臺北：正中書局，2000。

連橫，《臺灣詩乘集》，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5。

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南港：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1997。

黃美娥主編，《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文學作品目錄》，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3。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

張寶三、楊儒賓編，《日本漢學研究初探》，臺北：喜馬拉雅基金會，2002。

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臺北：聯經出版社，1985。

劉禾著・宋偉杰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2。

謝汝詮，《雪漁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村田雄二郎、C・ラマ－ル，《漢字圈の近代　ことばと國家》，東京：東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學出版會，2005。

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2000。

Peter Burke 著・賈士蘅譯，《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

二、報刊雜誌

《臺灣新報》，明治二十九年六月至三十一年四月，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微捲。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三十一年五月至昭和十九年三月，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微捲。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三十八年七月至四十四年十一月，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微捲。

《詩報》，昭和五年十月第一號至十九年九月第三一九號（中有殘缺），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

《三六九小報》，昭和五年九月至十年九月，臺北：成文復刻本。

《風月・風月報・南方・南方詩集》，（日本）河原功監修，臺北：南天書局復刻本，2001。

三、論文

（一）一般論文

陳培豐，〈殖民地臺灣國語「同化」教育的誕生——伊澤修二關於教化、文明與國體的思考〉，《新史學》12：1（2001.3），頁115-157。

陳培豐，〈重新解析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同化』國語教育政策——以日本近代思想史爲座軸〉，《臺灣史研究》7：2（2001.6），頁 1-49。

謝崇耀，〈試比較清、日政權於臺灣漢詩發展的成就與影響〉，《臺灣文學評論》3：3，(2003.7)，頁 107-122。

李東軍，〈風雅考——中日古代詩學比較〉，《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3：4（2003.7），頁 112-115。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臺灣風物》47：3（1997.9），頁 43-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學位論文

川路祥代，《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會》，臺南：成功大學中研所博士論文，2002。

呂淳鈺，《日治時期臺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考察》，臺北：政治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2004。

陳速換，《久保天隨及其澎湖游草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論文，2002。

陳怡如，《回歸風雅傳統——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2005。

四、會議論文

柳書琴，〈《風月報》中的同文論述：殖民主義附身的悲劇〉，「文學傳媒與文化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嘉義中正大學中文系主辦，2003.11.7-8。

柳書琴，〈從官製到民製：自我同文主義與興亞文學（Taiwan：1937-1942）〉，王德威、黃錦樹合編《想像的本邦：現代文學十五論》（台北：麥田，2005.05.05），頁63-90。

陳培豐，〈日治時期的漢詩文、國民性與皇民文學——在流通與切斷過程中走向純正歸一〉，《跨領域的臺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6），頁457-498。

廖振富，〈皇民化浪潮下的文化抵抗策略：論太平洋戰爭期間的櫟社活動及其創作〉，「皇民化與臺灣（1937-1945）臺日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日本拓殖大學主辦，2006.5.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hinese”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The Reconstruction and Difference on the Epistemology of Taiwanese Chinese Classical Forms of Poetry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Huang, Mei-E *

Abstract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1895-1945) in Taiwan, “Chinese” as an intermediary referring to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t gave rise to a variety of intricate hybrid and wrestl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Although this relation, “of the same language” grounded on “Chinese”, reflects the tense, suppressive, competing, or movable dimensions towards the colonial governance, it also reveals the transborder interac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Character Circle” among Japanese and Taiwanese traditional clerisy.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se fluid situations, multiple possibilities are shown beyond opposit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This thesis tries to avoid familiar “anti-coloni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 in observing the “of the same language” relationships. Moreover,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transborder flows on “Chinese”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and investigates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from the fluid situations. In the realm of Chinese classical forms of poetry in colonial Taiwan, that is still an untouched subject for Japanese researchers, below are a series of questionable points presented throughout the discussion: What significance does Japanese Chinese classical forms of poetry bring to Taiwan? How is it being quoted and appropriated, or being dragged and resisted at the crucial moment of the colonial governance? Then, as Japanese Chinese classical forms of poetry being imported, how is it being viewed, classified, compiled and criticized? What is the process of being categorized into the line of knowledge? In addition, how dose a knowledge system from a foreign land transform into local epistemology of Taiwa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s the transformation a resource sharing or harm from “of the same language” relation? Therefore, what kind of deduction will happen to the “Chinese imagination” of Taiwanese? Does the border of “Chinese” slide? Eventually, what influence will bring towards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aiwa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knowledge? How does the transborder equilib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proceed under a new order of literature knowledge?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n the whole,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provide a new viewpoint from the context of transborder flow. However, this route is by no means a total repudiation to former mainstream postcolonial discourse. In this way, a wider horizon is opened up in order to survey those potentially hidden questions. From three folds of aspects at issue: “Japanese come to Taiwan: a new page of colonial and transborder ‘Chinese’ “, “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Japanese Chinese classical forms of poetry: the imported and passed-down knowledge of Taiwan journalism and ‘Shi-Hwua’ “, and “ ‘Fong-Ya’ Discourse and others: the conver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n the epistemology of Taiwanese Chinese classical forms of poetry”, this thesis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and modification among Japanese and Taiwanese Chinese poetry in colonial background, so as to present the reconstruction and difference on the epistemology of Taiwanese Chinese classical forms of poetry under Japanese rule.

Keywords：Chinese of the same language crossing the border, Taiwan, Japa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Knowledge Production,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Fong-Ya’ Discours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